

#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 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黃雅蘭\*

---

投稿日期：106年11月7日；通過日期：107年3月20日。

\* 黃雅蘭為廣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e-mail: yalan24@jnu.edu.cn。

本文引用格式：

黃雅蘭（2018）。〈「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36: 51-90。

DOI: 10.30386/MCR.201807\_(136).0002

## 《摘要》

辨析「婦女解放」與「女權主義」二詞是理解中國婦女運動的重要視角。本研究對《人民日報》1949 至 2014 年的 1628 篇關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報導進行話語分析後發現，通過新聞的題材、核心人物和敘事框架等話語策略，「婦女解放」被建構為婦女運動的核心話語：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和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婦女解放」中，婦女參與社會勞動被看作解放的前提，性別平等主要表現為義務平等；「婦女解放」的內涵在不同歷史時期各有側重。1980 年代以來，「女權主義」話語的回歸為理解「婦女解放」提供了新的參照物。

關鍵詞：婦女解放、女權主義、人民日報、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話語分析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 壹、前言

在中國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婦女解放運動中，與婦女議題相關的話語發生著劇烈變化：十九世紀末，當維新派首次提出將「女子教育」作為民族振興的一項重要任務，feminism 被翻譯為「女權主義」、「女子主義」進入中國；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伊始，「婦女工作」就成為其革命的重要議程，「婦女」和「婦女解放」開始取代「女性」和「女權主義」進入中國性別議題的主流話語；19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大門的開放和西方思潮的重新進入，作為社會運動和學術理論的「女權主義」重新出現在大眾媒體和學術討論中。這些不斷更替的詞彙為理解中國婦女運動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提供了有趣的視角。

在政治傳播中，通過創造新的詞彙來推行新思想和政策的做法屢見不鮮，而在話語變遷的背後，則是不同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協商與角力，上述性別詞彙的更新正反映了中國婦女運動的行動主體、行動方式和行動邏輯的變化。本文試圖探究作為國家敘事的《人民日報》如何建構「婦女解放」話語，以及分析比較與「婦女解放」相關的其他性別話語，從而描繪和分析中國婦女運動的特殊進路。

## 貳、文獻回顧

### 一、「新話」：「女權主義」、「婦女解放」等詞彙的歷史語境

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1949/董樂山譯，2017，頁 249) 在小說《1984》中對英格蘭社會主義（英社）的官方語言「新話」（newspeak）

進行過如下描述：「新話的目標不僅是提供一種表達工具，用以表達對英社的忠實信徒來說合適的世界觀及思維習慣，而且要讓其他任何思考模式變得不可能存在。」儘管是小說家的虛構，但「新話」式的話語革命在歷次重大的社會變革中並不鮮見且扮演著重要角色。Arif Dirlik (1989, pp. 28-29) 認為，「革命應當創造一套自己的語言從而獲得對歷史的文化領導權，但是這種新的語言應當從過去的社會和語言中有所繼承以保證其易懂性和合法性」。在中國近一個多世紀的婦女運動中，話語的重建正是新思想和新政策獲得合法性和文化領導權的關鍵。

十九世紀末，清政府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知識份子和改革派開始引入西方思想開展救亡運動，feminism 就是其中之一。根據王政 (Wang, 1999) 的考據，由於此前「女權運動」這一中文詞彙就被用來指稱 19 世紀末發生在歐美的爭取女性權益的社會運動，在 20 世紀的頭 20 年中，中國知識份子採用「女權主義」、「女子主義」、「婦女主義」等詞語翻譯 feminism，其中，「女權主義」是最為主流的中文翻譯。

1920 年代，中國共產黨建立後，「婦女解放」被遴選成為其主流的革命話語，「女權主義」等詞語則被邊緣化，後者被認為包含有個人主義、女性氣質及精英主義等內涵，這與黨關於婦女運動的集體主張相矛盾 (Li, 1999)。通過分析中國共產黨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的官方文件，Harriet Evans (1998) 總結了「婦女解放」一詞的特殊用法：它是破舊立新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全社會解放的一部分，是由非女性主體領導的外部過程和集體行動，而「婦女解放」一詞通常作為被動的賓語出現在句子或段落的結尾。1949 年以來，「婦女解放」繼續作為主流話語擔負著鼓勵和動員婦女走出家門、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能，而這一話語壟斷從 1980 年代以來開始受到「女權主義」、「女性主義」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等話語的挑戰，在民間運動和學術領域，這些重新回歸的詞語更是得到廣泛使用。

與「女權主義」和「婦女解放」的話語更新類似，「女性」、「婦女」等詞語也有其特殊意涵。「婦女」一詞在中文裡由來已久，「婦」和「女」分別代指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是「對父系家庭中所有女性整體的注釋」；20 世紀 20 年代，「女性」一詞突然被「通商口岸的知識份子」廣泛使用，與「社會」、「知識份子」、「個人主義」等其他新詞一起，成為反儒家批判的重要話語符號（Barlow, 2004）。例如，1935 年上映的由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反映新興都市女性工作和婚姻生活的電影就以「新女性」為標題。然而，「女性」從一開始就沒有進入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1921 年發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首次提及了與女性相關的議題，使用的就是「婦女」一詞。Tani Barlow（1994, pp. 253-89; 2004, p. 206）認為，「女子」、「女性」、「女人」等詞彙會使人聯想到性別化的行為、特質和態度；而在共產黨的定義中，作為革命者的「婦女並不是由意志、情感、意識或肉慾組合而成的，而是經濟的、歷史的、理論的和公開政治的，其所指的是『世界的工人們』」。

本文要探究的正是「婦女解放」、「婦女」等詞彙在中國國家話語體系中的特殊性，特別是其與「女權主義」、「女性」的差異。為行文方便，本文使用不帶引號的「女性」、「婦女運動」、「婦女解放」等詞作為一般的性別指稱，使用帶引號的「婦女」、「婦女運動」、「婦女解放」特指中國國家敘事中的特殊表述。

## 二、《人民日報》：作為性別話語實踐的大眾傳媒

特定的詞彙和話語是連接國家意識形態和公眾意見的紐帶，以報紙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在揭示語言建構文化領導權進而影響民意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1942 年 4 月，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社論寫道，報紙的任務包括「充實群眾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啟發他們的覺悟，教導他們，組織他們」（〈致讀者〉，1942 年 4 月 1 日）。隨著《解放日報》改版為「完全黨報」並發展為後來的《人民日報》，報紙的此種任務成為中國黨報的重要傳統，並且貫穿在群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在婦女的受教育水準遠低於男性的革命年代裡，黨組織規定，偏遠農村的婦女應當加入讀報團（〈中央蘇區宣傳文化建設大事記：1931 年〉，無日期）。

目前有關中國大眾媒體性別話語的研究多圍繞婦女報刊展開。例如，陳陽（2006）對 1990 至 2002 年間《中國婦女報》做內容分析，指出當前中國女性新聞的碎片化特徵；王政（2010）則將《中國婦女》雜誌稱作「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文化障地」，認為它揭示了新中國建立之初黨內的社會性別矛盾和鬥爭；王蕾（2011）分析了《中國婦女》雜誌 60 年來封面人物形象的變化，指出其經歷了從「生產偶像」向「消費偶像」的轉變等。上述研究有助於審視婦女作為權利和行為主體在參與和拓展話語空間中的能動性；但是，婦女解放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其目標影響群體不僅僅侷限於女性，因此有必要對面向全民的性別話語實踐展開考察。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擔負著「積極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宣傳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及時傳播國內外各領域資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訊」的職能；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黨中央都從辦報思想、方針、內容到內部建設等方面對其作出明確指示」（〈報社簡介〉，2016）。如同現當代中國的許多政治運動一樣，婦女解放的動員和開展也往往是通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大眾媒體完成的。因此，《人民日報》提供了解讀國家性別話語的最佳平臺。

### 三、研究問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話語流變

在歐美發展起來的女權主義理論根植於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說，認為對兩性差異的錯誤認知導致一系列歧視女性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因此提倡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以使女性獲得自由，這種自由既包括個人自主性（personal autonomy）——能夠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自主性（political autonomy）——能夠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環境施加影響（Tong, 2014, pp. 11-13）。這種產生於西方社會土壤的女權主義學說並不適用於對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婦女運動做出闡釋，上文王政所提到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更符合中國的歷史和社會語境。<sup>1</sup> 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是相互強化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被改變的情況下，婦女的受壓迫地位才有可能得到徹底的改善。這種觀點可從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8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99）關於私有制導致婦女地位衰落和母系社會結束的論述中找到源頭。在 20 世紀席捲全球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

<sup>1</sup> 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接近的概念是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Marxist Feminism），後者認為女性受壓迫的終極原因是階級歧視，而非性別歧視；前者則認為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女性受壓迫。二者的共性大於差異性，均認為女性受壓迫是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產物，在一些研究中被相互替換使用（詳見 Tong, 2014, pp. 93-124）。

革命和運動中，蘇聯、中國、越南、古巴以及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的正是這種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婦女解放運動，正如列寧（Vladimir Lenin, 2011, p. 2）所說，世界婦女的最終解放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實現；而除蘇聯之外的其他民族國家通常還面臨著生產力低下以及後殖民的社會境遇，故而，在階級鬥爭之外，婦女的權益與解放往往還被編織進了國族主義以及反抗殖民／帝國主義的話語中（Lišková, 2016; Molyneux, 1981; Turley, 1972）。

由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出發，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信息媒介和共識製造者的《人民日報》，如何建構「婦女解放」這一話語並將之轉換為公眾接受的共識？

孤立的信息無法構成話語，話語須是由一系列信息——即一整套語言系統——構成。例如，所謂的現代醫學話語是由醫院、醫生、護士、醫學院等一系列概念構成，而每個概念都要遵從這一話語系統的邏輯（Foucault, 1963／劉北成譯，2001，頁 219）。「婦女解放」話語同樣由一系列概念和意義單元構成，包括婦女解放的鬥爭對象、領導主體、實現方式和最終目標等等。因此，本文試圖對這些話語構成要素做逐一探討。

上文提到，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在中國的近代革命中，階級鬥爭不僅表現為消滅國內的官僚資本主義，也表現為對國內封建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1927 年，毛澤東（1960，頁 48）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種權力的支配——政權、族權和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一論斷奠定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調，而這壓迫女性的四權的核心就是封建主義。因此，中國婦女運動中所包含的階級鬥爭同時涵蓋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以及同封建官僚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階級之間的衝突。此外，中國的婦女運動還具有反帝國主義的屬性，正如婦女運動領袖蔡暢（1949年12月11日）所言：

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必須使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結合起來，才能使民族解放事業勝利開展，同時，婦女解放運動也才能勝利開展。

因此，中國婦女運動中的階級鬥爭還表現為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及其在階級話語下所衍生出的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和假設。

問題 1：階級鬥爭以怎樣的頻率出現在《人民日報》有關婦女解放的報導中？如何呈現？

假設 1a：在涉及外國的相關報導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頻率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頻率。

假設 1b：在相關報導所涉及的主要外國人物中，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數多於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數。

由於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婦女解放」有著鮮明的無產階級屬性，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 2a：在相關報導中，黨政機構及其附屬組織的出現頻率高於其他社會組織。

假設 2b：在相關報導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中，黨政機構的管理和人員的出現頻率高於其他職業階層的人員。

除了階級鬥爭，勞動和工作也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核心要素。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作為一種關於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強調工作在人性和人的自我認知中的核心作用；作為一種關於歷史

和社會變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強調不同經濟模式中的工作關係在製造社會不平等和剝削中的作用，例如，強調私有制在種族和性別不平等中的作用（Marx, 195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85，頁 75-76）。因此，婦女只有通過工作賺取收入，才能獨立於男性，才能不再依附於家庭並擺脫以家庭為基礎的父權制；而且，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家務勞動和撫養兒童的工作被國家公共化，婦女才能夠真正地實現解放（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86，頁 21）。據此，本研究推斷，《人民日報》在對婦女解放進行報導時，會強調婦女在工作領域的表現以及她們為生產發展做出的貢獻，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和假設：

問題 2：《人民日報》主要關注女性的哪些行為？體現出了女性怎樣的權利與義務？

假設 3：在相關報導中，婦女出現在公共領域的頻率高於其出現在私人領域的頻率。

假設 4：在相關報導中，婦女的貢獻、成就、責任比其獲益、消費更多地被提及。

根據 1949 年以來中國婦女運動的開展狀況和宏觀政治背景，本研究將 1949 至 2014 的 65 年劃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十七年時期（1949-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全新的性別秩序在黨國的主導下建立起來；文革時期（1966-1976）：男女平等政策的鞏固和強化；改革開放初期（1977-1994）：西方性別研究進入中國，性別差異回歸；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下簡稱「世婦會」）在北京召開以來（1995-2014）：西方性別運動影響的深化和中國民間女權運動的興起。基於這一時代劃分，本研究提出：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問題 3：歷時地看，不同歷史時期《人民日報》對「婦女解放」的報導呈現出怎樣的差異和共性？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 四、研究方法

### （一）資料抽樣與測量

本文對 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之間《人民日報》涉及婦女運動的報導進行分析。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解放革命」常常被簡寫為「婦女運動」、「婦女革命」，可與「婦女解放」替換使用；而如上文所述，「婦女解放」之目的在於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之權利，故而「婦女權益」、「女性權益」也是本研究涉及的關鍵詞；再者，由於本文旨在對「婦女解放」與「女性主義」兩種話語做對比研究，故與之相關的「女性」、「女權」、「女性主義」也被納入搜索關鍵詞。<sup>2</sup> 以上述關鍵詞對人民日報 1949 年至 2014 年的報導進行搜索，最終獲得 1628 篇報導作為研究對象。

本文結合量化的內容分析和質化的話語分析對上述報導進行探索。內容分析分為兩部分，分別以每條新聞報導和新聞報導中的主要人物作為分析單位。在以新聞報導為單位的分析中，本文對報導的體裁、題材、所在版次、所涉及的國家、組織等進行編碼和統計；在以主要人物為單位的分析中，人物的性別、職業、階層、國別、年齡、能動性及其

---

<sup>2</sup> 以「女權」為關鍵字搜索，能夠得到與之相關的「女權主義」、「女權運動」、「女權論」等不同詞語的表述方式，這些詞語在《人民日報》中的不同含義和用法，下文也會做深入的辨析；此外，「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均為英文 *feminism* 的中文翻譯，前者出現時間較早，後者則是 1980 年代以來才逐漸出現的譯法。在本研究的一般行文中，使用「女權主義」指代 *feminism*，但二者在《人民日報》中的用法略有差異，在後文會做進一步的區分。

所處領域（例如，公共領域或私人領域）將被編碼統計。

量化的內容分析旨在勾勒新聞報導的整體情況，檢驗研究假設；在此基礎上，本文還將因循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思路對新聞報導做話語分析，在懸置既有理論的情況下檢視經驗文本，通過將事件與事件、概念與概念、事件與概念進行連續比較，形成代碼、類屬及其屬性，從而形成結論（Strauss & Corbin, 1990, pp. 61-42）。這種研究方法將有助於加深對「婦女解放」話語背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動因的理解。

## （二）研究對象的整體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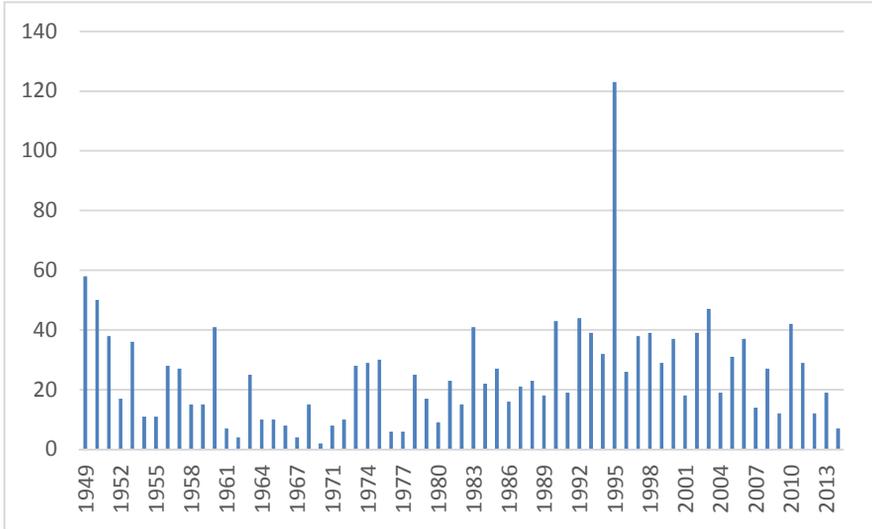
由圖一可知，《人民日報》有關婦女解放的報導在十七年時期以及 1990 年代以來的出現頻率更高，特別是在 1995 年世婦會當年出現了 123 篇報導，文革時期的報導數量較少。從報導的體裁看，消息所占比重最高（731 則，44.9%），其次分別是通訊（344 則，21.1%）、評論（222 則，13.6%）以及官方文件或講話稿（171 則，10.5%）。<sup>3</sup> 其中，通訊有著較強的宣傳性，是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反應；評論的一個重要構成——社論——也值得注意：《人民日報》自 1955 年起每年「三八」婦女節都會發表有關婦女解放的社論，這些社論同官方文件和講話稿一樣，彰顯了國家對婦女運動的態度和指示。

---

<sup>3</sup> 本文將新聞報導的體裁劃分為消息、通訊特稿、調查性報導、社論、一般評論、官方檔或官員講話稿、理論學術討論、讀者來信和散文隨筆等文藝作品九個大類。其中，通訊特稿指宣傳意味較濃的典型人物和事蹟報導，調查性報導指具有較強新聞價值的深度報導。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圖一：1949 年至 2014 年《人民日報》有關婦女解放的報導的時間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報導的題材看，政治議題所占比重最高（1029 則，63.2%），其次分別是社會（211 則，13%）、文化（129 則，7.9%）、經濟（117 則，7.2%）、軍事（74 則，4.5%）議題。歷時地看，政治議題在文革時的比重高達 77%，其他階段則保持在 60% 左右；社會類議題在十七年和文革時僅占比 9.2% 和 5%，改革開放以來則增長到 14% 以上；軍事類議題的報導有著很大的斷層，十七年和文革時期均保持 10% 以上的比重，後兩個時期則降至 2% 以下，題材的變化反映出相關報導政治色彩的弱化。新聞報導所處版次反映其重要性的變化，在所有關於婦女解放的報導中，18.3% 位於頭版，而從總的趨勢來看，頭版報導的比重不斷降低，在四個階段分別為 24.6%、26.4%、19.8% 和 11.6%。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人民日報》關於婦女解放的報導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宣傳性，但政治性和宣傳性也呈現出逐漸弱化的趨勢，具體

表現在官方文件或講話稿的比例顯著降低，頭版比例逐漸降低，以及報導的議題更加多樣而均衡。

## 肆、研究結果

### 一、階級鬥爭：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婦女解放

#### （一）婦女解放運動的目標：反帝、反封、反資的同構

在 1628 篇報導中，37.5% 的樣本出現了關於階級對立和意識形態衝突的內容；十七年和文革時期，這一比重分別高達 69.7% 和 82.9%。對於階級矛盾的描述，有的是以具體事例作為載體，詳細剖析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何壓迫女性，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廢娼運動中，《人民日報》發表了〈解放妓女〉等評論，將娼妓現象歸咎於「三座大山」的壓迫，「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剝削，許多妓女受著嚴重的生活驅迫或被惡棍流氓分子所拐騙與陷害而淪為娼妓」（人民日報，1949.11.22: 6）。另一種表述則是將「婦女解放」與階級鬥爭的政治口號機械疊加（superimposition），而未論及二者之間的具體關係，如 1976 年文革末期的報導這樣寫道，「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十年，是廣大婦女同全國人民群眾在一起，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同黨內走資派激烈鬥爭的十年，也是婦女解放運動在鬥爭中迅速前進的十年」（人民日報，1976.8.21: 1）；即使在改革開放後，「婦女解放」還是繞不開階級鬥爭的主題，如 1987 年全國婦聯發出的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活動通知提到：「當前正在開展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成敗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前途」（人民日報，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1987.2.17: 4)。歷時地看，報導中出現階級對立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比重不斷下降，在文革後的兩個階段分別為 34.1% 和 9.8%。研究問題 1 得到解答。

對假設 1a 的驗證：在涉及外國的報導中，社會主義國家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出現頻率差異不大（見表一）。<sup>4</sup> 但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非常明顯，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在全部報導中的出現頻率均高至 40% 左右，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倍多。此外，報導對兩類國家有著迥異的價值評價，社會主義國家被看作「統一戰線」，例如，對 1949 年亞洲各國婦女代表聯歡會的報導提到：

在洋溢著生動的國際主義熱情的會場裡，隨著中國婦女鬥爭事蹟的報告，我們又聽到了蒙古代表、朝鮮代表和蘇聯代表的民歌，這民歌雖帶有她們自己國家的民族風格，然而在我們聽起來，就好象是我們家鄉裡的姊妹的聲音（陳跡，1949 年 12 月 8 日）。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被塑造為婦女的剝削者，「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裡，婦女們仍舊遭受到不平等的壓迫和歧視。例如，據官方統計：美國女工的平均工資比男工平均工資低 29%，英國低 39% 到 41%」（人民日報，1959.3.8: 6）。

---

<sup>4</sup> 本文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定義是根據時間和其政權的變化而有所調整的，例如匈牙利、波蘭等國家在 1989 年之前算作社會主義國家，1989 年之後算作資本主義國家。

表一：不同類型國家在報導中的出現頻率

時期	中國大陸	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十七年	81.8 (328)	22.2 (89)	45.9 (184)
文革	65.7 (92)	14.3 (20)	38.6 (54)
改革開放	90.0 (396)	10.9 (48)	2.0 (9)
世婦會以來	86.3 (556)	10.7 (69)	3.1 (20)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革結束後，外國的出現頻率整體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頻率的下降幅度則更大，僅出現在 3% 左右的報導中，資本主義國家則仍舊保持著 10% 以上的出現頻率。主要新聞人物的國籍分佈也呈現出類似的特徵：1976 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頻率都更高，1976 年後比重則大大下降；相反，新聞報導對國內事務和人物的提及頻率都在文革時達到最低點，而在文革結束後大幅提高甚至超過文革之前的水準（見表二）。這與中國在 1976 年之後的政策轉向有著密切的聯繫：此前，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語境中，國外的無論「敵」或「友」都受到高度重視；1976 年後，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基本路線，更加關注自身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對國內事務的關注程度提高；從國際形勢來看，冷戰的結束使國際關係也發生劇烈變化，資本主義國家不再是階級敵人，反而成為經濟現代化的楷模和標誌。故而，婦女政策的階級和意識形態屬性也在逐漸淡化。因此假設 1a 和假設 1b 部分得到驗證：1976 年以前，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1976 年之後，這一特徵則不再明顯。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表二：主要新聞人物的國籍分佈

時期	中國大陸	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十七年	72.7 (157)	10.6 (23)	11.6 (25)
文革	57.4 (31)	5.6 (3)	33.3 (18)
改革開放	92.6 (175)	5.3 (10)	1.1 (2)
世婦會以來	92.3 (277)	1.7 (5)	0.3 (1)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二）婦女解放運動的領導主體：去革命化和精英化轉向

從婦女運動的領導主體來看，各級婦聯、各級黨政機關和國際組織的出現頻率最高，分別出現在 56.2%、54.4% 和 24.2% 的報導中，企業、高校及研究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出現頻率則非常低；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各級婦聯（70.4%）和黨政機關（62.4%）的出現頻率尤其高（見表三）。創建於 1949 年 3 月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婦聯」）是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婦女組織，儘管是社會群眾團體，仍然受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並按照行政區劃建立各級組織（〈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介〉，2008）。在報導中，黨政機關及婦聯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如下表述頻現報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新中國的婦女已經掙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的奴役和壓迫」（人民日報，1952.6.15: 2），「（全國婦女）在全國婦聯新的領導機構指導之下，必將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達到更廣泛更鞏固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9.21: 4）；而婦聯受到黨的領導的表述也不鮮見，「各地婦聯在黨的領導下，提倡和鼓勵了婦女積極參加技術革命」（人民日報，1958.3.8: 2）。故而，假設 2a 得到驗證。

表三：不同時段新聞報導所涉及的機構

	各級婦聯	各級黨政 機關	國有企 事業單位	高校及 研究機構	國內外私營 商業機構	國際組織
十七年	50.0(172)	48.0(165)	10.8(37)	0.9(3)	0.6(2)	48.5(167)
文革	70.4(88)	62.4(78)	4.8(6)	0.8(1)	0.0(0)	23.2(29)
改革開放後	62.1(187)	52.5(158)	5.3(16)	2.0(6)	2.3(7)	10.3(31)
世婦會後	53.0(241)	58.5(266)	4.8(22)	3.5(16)	2.0(9)	15.2(69)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組織的出現頻率發生了較大變化，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屬性的變化。十七年和文革時期，報導涉及的國際組織主要為國際民主婦聯（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WIDF），該組織 1945 年成立於巴黎，致力於團結各國婦女、反對法西斯主義；冷戰期間，國際民主婦聯則成為由蘇聯共產黨領導的、支援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組織（de Haan, 2012），中國在該組織及其領導的亞洲婦女代表會議、國際婦聯理事會等活動中也扮演了積極角色。1960 年代以來，隨著中蘇關係破裂，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和蘇聯領導下的國際民主婦聯漸行漸遠，特別是 1963 年，世界婦女大會放棄「反帝國主義」主張，《人民日報》發表多篇文章批判國際民主婦聯，如〈世界婦女大會上兩條路線的鬥爭〉（1963.7.6: 3）；文革結束後，國際民主婦聯則幾乎消失在《人民日報》上，取而代之的是聯合國及其下屬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婦女發展基金等國際組織，箇中原因正如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李淑鐸所言，「在眾多廣泛的國際活動中，我們十分重視聯合國的作用。自 1971 年 10 月，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後，我國積極參與了聯合國系統婦女領域的活動」（人民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日報，1995.6.21: 3)。對聯合國婦女活動的積極參與也促進了中國婦女權益保護的進程，如在 1985 年第三次世婦會上簽署《內羅畢戰略》後，中國政府進一步完善了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在 1995 年北京世婦會的歡迎儀式上，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一次提出「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人民日報，1995.9.5: 1）；會後，以此次世婦會為契機制定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提出了有關女性參政、就業、走出貧困等目標。與這些法律法規、基本國策、目標綱要有關的報導也以較高頻率出現於世婦會後的《人民日報》中。

在樣本中出現的全部 759 位主要新聞人物中，女性占比 62.2%，男女比例在四個階段沒有顯著差異。從社會階層來看，黨和國家領導人占總數的 26%，普通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占比 34.3%，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9.2%），農業勞動者和產業工人共占總數的 14.6%。<sup>5</sup> 假設 2b 得到驗證。

值得注意的是，1976 年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比重明顯上升，普通管理者的比重則顯著下降（見表四）。該現象或與中國婦女運動的具體政策有關：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採取多項改革措施來建立新的性別秩序，特別是出臺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以及隨後的《選舉法》和《憲法》以保障婦女的婚姻自由和政治權利，掀起關閉妓院、土

---

<sup>5</sup> 本研究對於主要新聞人物的階層劃分主要參考陸學藝的十大社會階層並根據本研究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基層官員、經濟管理及商業階層、明星及文藝界、專業技術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軍人員警武警等、未成年人及學生以及無業、失業及半失業階層。其中將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基層官員從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中分離出來，主要目的在於考察中國女性運動中的領導層級狀況。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界定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2/content\\_1540150.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2/content_1540150.htm)；基層官員包括村級及街道、居委會的工作人員。

地改革等運動保障其經濟權益，興建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以將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這些法律和政策都需要相關領域的行政官員而非最高領導人來貫徹和實施，因此報導中多出現執行相關法律政策的管理階層；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性別政策主要包括召開聯合國婦女大會、頒布《婦女權益保護法》等，這些多涉及最高領導層的出席和發布，故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比重顯著上升。

表四：新聞報導中主要人物的階層分佈

	十七年	文革	改革開放後	世婦會後
黨和國家領導人	17.6(38)	11.1(6)	35.4(67)	29.0(87)
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	46.3(100)	50.0(27)	32.8(62)	23.7(71)
經濟管理及商業階層	0.0(0)	0.0(0)	1.6(3)	5.0(15)
基層官員	2.3(5)	14.8(8)	1.6(3)	4.7(14)
明星及文藝界	0.5(1)	0.0(0)	0.5(1)	2.3(7)
知識分子	7.9(17)	1.9(1)	10.6(20)	10.7(32)
產業工人	9.3(20)	3.7(2)	1.6(3)	8.7(26)
農業勞動者	10.2(22)	9.3(5)	5.8(11)	7.3(22)
軍人、員警、武警等	3.7(8)	9.3(5)	8.5(16)	5.7(17)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婦女解放」的領導主體中，一種特殊的領導角色——「大姐」——值得注意。《人民日報》的報導中，被稱作「大姐」的包括從中央級領導到基層婦女工作者在內的不同婦女：包括專門從事婦女工作的中央級領導鄧穎超、蔡暢、康克清、彭珮雲和處在法律、紀檢等專業領導崗位的史良、章蘊等，以及年齡較大的有著豐富的戰鬥、勞動和其他社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會建設經驗的基層婦女，她們通常被塑造為年輕女性求助或效仿的對象。不同於其他領導角色，「大姐」這一稱謂通過將年齡和性別兩個要素結合起來，一方面強調社會性別特徵，給人以資歷深厚卻又親切、溫暖的交流感，與此同時，也通過「年長」這一要素消解了包含在社會性別當中的性意味，成為我國婦女解放運動中一種特殊的領導主體。

此外，基層工農業勞動者和文化、技術和商業界人士的可見度變化也值得注意：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的比重在 1977 年後顯著下降，文化和商業界人士卻出現了從無到有的轉變。改革開放政策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這一時期，社會上「湧現出了更多德才兼備的優秀女廠長、女經理、女企業家、女科學家以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女狀元、女能人」（人民日報，1985.3.8: 1）。這種變化一方面體現出女性主體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婦女解放運動的日益精英化。1980 年代，在「告別革命」的社會思潮中，伴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引入，婦女研究、性別研究等項目和機構開始在大學中建立起來，並在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內發展出生長空間（Tsiong, 2001），知識分子開始在婦女解放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高校及研究機構以及知識分子在《人民日報》相關報導中出現頻率的提高便是印證；與此同時，自由、權利、尊嚴、唯美等個人主義的人文價值也開始進入中國婦女運動的政策話語中，例如，1983 年起，時任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將「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定義為「改革競爭的大環境中」的「新女性意識」。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中，女學者、女經理、女企業家、女明星等成為了新聞報導的「寵兒」。從階層的角度看，1976 年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個人訴求形成一個較長時間的壓抑狀態」（柏棣，2014，頁 158），改革開放後，先前被壓抑的、擁有較多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女性的可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對，勞動婦女的絕對主體

地位不僅受到動搖，甚至面臨著邊緣化的危險。

## 二、從義務到權利：以勞動為核心的婦女解放

在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傳統中，勞動是婦女獲得解放的關鍵條件。《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分別有 39.8%、43.3% 和 9.5% 的主要新聞人物處於「普通工作職業」、「政黨法律」和「戰鬥解放」等公共事務中；僅 6.1% 和 0.3% 的人位於「家庭情感」和「休閒娛樂」等私人領域，假設 3 得到驗證（見表五）。<sup>6</sup> 有關公共領域中婦女的報導大多強調其對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及政權穩定做出的貢獻。而涉及家庭情感的報導則多是負面地表現舊社會和舊制度對婦女的壓迫，例如 1950 年《人民日報》的報導〈不堪婆婆丈夫虐待 王娥狄被逼自殺〉（1950.6.28: 4）。

表五：不同時段新聞人物所處場景

	政黨法律	普通工作職業	戰鬥解放	家庭情感	學習教育	休閒娛樂消費
十七年	46.3(100)	38.4(83)	5.6(12)	7.4(16)	1.4(3)	0.5(1)
文革	48.1(26)	37.0(20)	14.8(8)	0.0(0)	0.0(0)	0.0(0)
改革開放後	31.2(59)	41.8(79)	20.6(39)	5.8(11)	0.5(1)	0.0(0)
世婦會後	48.0(144)	40.0(120)	4.3(13)	6.3(19)	1.0(3)	0.3(1)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sup>6</sup> 「普通工作職業」指婦女參與一般性的工農業生產勞動，如被稱作「鐵姑娘」的大寨婦女從事農業勞動；「政黨法律」指婦女在黨和政府部門擔任領導工作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如在我國黨政部門任職的多位「大姐」——如擔任過婦聯主席的蔡暢、康克清以及中國首位司法部部長史良等——從事的工作；「解放戰鬥」則指婦女在民族解放戰爭和反帝戰爭中英勇戰鬥，例如，「在朝鮮前線從事醫務、文藝、報務、政治等工作」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女戰士」。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勞動之於婦女解放的重要性，在新聞報導中通過普通婦女和黨政領導人之口在個體的和集體的層面上得到解釋。例如，山西農村女青年李潤花在解釋自己拼命幹活時說，「婦女要徹底解放，就得自己勞動，不靠男的養活」（人民日報，1951.9.17: 3）；朱德則將勞動表述為中國婦女的集體訴求，「婦女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發動廣大婦女群眾參加生產。因為只有當婦女能夠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事業，婦女的完全徹底的解放才成為可能」（1950.3.8: 1）。

對於勞動的強調在文革期間通過「鐵姑娘」這一符號以及「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而達到頂峰。「鐵姑娘」最初是對文革期間大寨青年婦女突擊隊的讚譽，稱讚其在農業生產中「鐵肩挑重擔」，並無與男性競爭的含義；然而，受到大寨姑娘的激勵，也由於當時國內勞動力不足，「鐵姑娘」的勞作方式開始遍地開花（金一虹，2006），《人民日報》上隨後又出現了女子採油隊、女子架橋班、女子帶電作業隊、女子鑽井隊等挑戰傳統性別分工的工作小組。伴隨著「鐵姑娘」模式的推廣，毛澤東的名言「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開始頻繁見報端。事實上，這句話最初於1965年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報導〈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1956.5.27: 1），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水庫游泳時看到幾個女青年從身後遊上來時發出的感慨。而這句話再次出現是在1970年3月8日，《人民日報》將其作為通欄標題用以報導勞動婦女的先進事蹟（人民日報，1970.3.8: 2）。自此，這句話便成為「婦女解放」的重要宣言。

對假設4的檢驗發現，47.1%和30.3%的新聞報導分別採取了「生產／貢獻／責任」和「消費／獲益／權利」的報導框架，對於婦女權益的報導遠少於對女性責任義務的報導，假設4得到驗證（詳見表六）。「生產／貢獻／責任框架」指報導強調婦女參與生產勞動，對社

會建設做出貢獻，及其對於階級、民族和國家所擔負的責任和義務。例如，新中國建立伊始，全國婦聯秘書長區夢覺（1949.10.12: 4）就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應該是今後中國婦女運動的中心任務」；在《人民日報》上，即便談及與婦女權益緊密相關的生理衛生議題，也要強調其對於國家生產建設的意義，例如：

婦女在孕期、產期，是不是休息得好，調養得好，對身體健康有重大的關係。生了病，不但個人痛苦，還會妨礙孩子的發育成長，影響家庭生活的幸福，而且關係到全國一半勞動大軍持久勞動的問題（人民日報，1958.12.14: 2）。

在這種表述中，女性個體的權益被融入國家建設的集體責任中。不同於歐美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著眼於女性獲得平等的個人權利、機會和自主性，發端於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的中國婦女解放所倡導的性別平等主要是義務平等而非權利平等（Zuo, 2013）。隨之而來的是「婦女解放」呈現出的工具性特徵，例如，有關「婦女解放」的任務和目標的表述一直隨中國的政治風雲而變化：1957 年「反右」開始後，「擺在我們全國婦女面前的任務是繼續提高社會主義思想覺悟，在黨的領導下，弄清關於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順利的過社會主義這一關」（人民日報，1957.8.30: 4）；文革中，婦女運動的任務包括「不斷地同黨內資產階級鬥，同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一類走資派鬥爭」（人民日報，1976.8.21: 1）；撥亂反正時，婦女的任務是「積極參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大膽解放思想」（人民日報，1979.2.14: 1）；改革開放深入開展時，「依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黨全國工作總方針，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定為中國婦女運動的方針」（人民日報，2001.6.23: 5）；對於舉辦世婦會，也要認識到這是「我國在本世紀內承辦的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性會議，……充分利用舉辦大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會的機會，使各國與會人士更多地瞭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等各項事業的成就，擴大我國的政治影響，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人民日報，1995.6.10: 2）；甚至在反對法輪功時，都要「發揮婦女在崇尚科學反對迷信中的作用」（人民日報，1999.8.6: 3）。

表六：關於婦女責任和權益的報導框架分佈

	生產 / 貢獻 / 責任	消費 / 獲取 / 權利	二者都有	不適用
十七年	49.6(200)	20.6(83)	11.7(47)	18.1(73)
文革	63.6(89)	11.4(16)	8.6(12)	16.4(23)
改革開放後	56.1(247)	26.1(115)	7.3(32)	10.5(46)
世婦會後	35.7(230)	43.3(279)	10.5(68)	10.5(68)

註：數字為百分比，括弧內為報導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種對於義務的高度強調在 1976 年後發生了較大變化，有關女性權益的報導大量出現。這種變化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改革有著密切的聯繫。改革開放後，城市私營企業的引入以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得效益、效率等市場邏輯成為主導，此前受國家保護的婦女平等就業、醫療衛生以及土地所有等權益受到挑戰（人民日報，1988.1.29: 2），過去被視為女性義務的勞動成了女性需奮力爭取的權利；此外，「改革也使被淡化、甚至被壓制了的婦女的主體意識得到復甦」（人民日報，1989.3.8: 1），女性開始主動表達自己的訴求，通過讀者來信傾訴不滿和尋求幫助成為這一時期《人民日報》上的特殊現象，出現了諸如〈分房不給女方對嗎？〉（1993.4.27: 5）、〈我改嫁能否帶走兒子？〉（1997.12.3: 9）等文章。對此，國家一方面倡導女性培養上文提到的「四自」新女性意識，以應對「改革競爭的大環境」；另一方面也

採取務實措施以保障女性權益，如 1992 年正式通過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女性的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益、勞動權益、人身權利、婚姻家庭權益等進行了明確說明，《人民日報》報導了大量與該法律相關的案例和專家解讀；世婦會後，隨著全社會對性別議題關注度的提高，過去被認為不登臺面的性騷擾、家庭暴力等議題也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如〈拒絕性騷擾 維護人格尊嚴〉（2003.10.26: 8）、〈家庭暴力：女性之隱痛〉（2004.2.27: 6）；隨後，這些議題也被寫入了 2005 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正案以及各地更加細化的法規中，例如〈上海立法細化婦女權益保障 首次界定五種性騷擾形式〉（人民日報，2006.10.30: 10）。

然而，對於女性權益的關注並未徹底稀釋社會主義運動對女性責任的強調，「婦女解放」對於權利的彰顯以及社會主義運動對其成員勞動與義務的要求則帶來了關於婦女權責的相互矛盾的倡議。以與女性緊密相關的「家務」議題為例，1955 年左右，黨和政府一方面呼籲將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舉辦幫助婦女減輕家務的公共事業，以增進婦女參加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可能」（人民日報，1955.4.15: 3），另一方面又強調婦女的家庭責任，要求其「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因為「全體婦女，不論是家庭主婦或者是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都有責任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人民日報，1957.9.9: 1）。而近年來，「賢妻良母」這一長期被批判的社會角色重又被《人民日報》倡導：「積極發揮婦女在家庭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宣傳新時期賢妻良母、孝女善鄰時代典型」（人民日報，2013.11.2: 4）。在這種性別話語中，「婦女解放」在為國家政策背書的同時也消解了婦女的主體性。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 三、話語協商：「女權主義」的回歸和中國特色婦女理論的創立

上文提到，1920 年代「女權主義」一詞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話語中被邊緣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事實上，「女權」一詞在《人民日報》中多有出現，指代正面意義的「婦女權益」或「婦女權利」，是「婦女解放」要實現的目標，如「爭取女權、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總是從屬於整個社會革命的」（人民日報，1964.9.19: 5）。而「女權論」、「女權運動」和「女權主義」等詞語卻總是以負面形象與「資產階級」同時出現，被置於「婦女解放」的對立面。例如，蔡暢認為「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有著「把婦女運動從革命運動中孤立起來、脫離政治以及排斥勞動婦女的錯誤傾向」（人民日報：1978.3.10: 2）；再如，文革中《人民日報》曾提到，「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這樣瘋狂地反對婦女參加革命鬥爭，宣揚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正是妄想破壞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1968.3.17: 4）；此外，在對四人幫進行批判時，江青也被認為「打著批判男尊女卑的旗號，大肆販賣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反動理論」（人民日報，1976.12.24: 5）。

《人民日報》第一次不以負面語調提及「女權主義」，出現在 1985 年美籍華裔學者於梨華關於美國文化的隨筆中：「尤其是少數鬥爭性強的女權主義者，她們是長褲西裝，男式襯衫，外加長靴一雙，更把褲腿插入長統裡，西裝領半豎，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派頭」（人民日報，1985.5.22: 8），這裡的「女權主義」被看作美國文化的代表。此後，報導中「女權主義」的出現頻率儘管有所提高，但仍不常出現，並且在應用範圍和指涉對象上有很大的侷限性：首先，「女權主義」通常出現在關於歐美女性的報導中，中國本土的「女權主義」或「女權運

動」從未出現過；其次，不含負面色彩的「女權主義」多出現在文學批評、社會理論等文章中。在這種表述中，「女權主義」儘管不再被貼上「資本主義」的負面標籤，卻又被隱蔽地建構成一種外來的、非實踐性的理論和文化現象。更甚者是，當《人民日報》論及社會問題時，又會出現對「女權主義」的汙名化。例如，將「女權思想」同「所謂的美女寫作、下半身寫作、胸口寫作」相聯繫（2006.5.25: 9）；或將女權主義同大男子主義並置，例如，一篇評論中提到，為避免婚姻問題，「夫妻雙方應有學習意識，懂得婚前重選擇，價值觀不認同，如大男子主義、女權主義嚴重者不選擇」（2013.1.9: 13）。

隨著「女權主義」話語的回歸以及西方性別研究理論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話語和學術討論中，中國官方也發展出了一套相應的理論體系，並通過《人民日報》加以傳播。2000年，時任全國婦聯主席彭珮雲提出，「對國外各種婦女理論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認真的研究與鑒別」，特別是對「西方社會性別理論」，要看它「是否揭示了產生性別不平等的最終根源？它能否全面解釋今天存在的各種婦女問題的原因？它能否揭示婦女解放的條件與道路？」（人民日報，2000.2.15: 9）參照當時的經濟政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彭珮雲提出創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理論」。2007年，時任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再次提出「加強對中國特色婦女運動特徵和規律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體系」（人民日報，2007.12.23: 4）。自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的提法被固定下來，成為與「西方社會性別理論」相對應的中國的性別理論話語。

與「女權主義」有著相似命運的是「女性」一詞的運用。改革開放前，《人民日報》上極少出現「女性」，即使出現，其使用方式也迥異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於「婦女」。首先，「女性」更多地出現在關於國外、特別是歐美——包括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女性的報導中，如「蘇維埃的女性從來不需要為自己和孩子的前途而感到擔憂」（人民日報，1949.12.12: 1），「關於禁止歧視女性的『憲法平等權利修正案』從一九二三年被提出後，在美國國會裡躺了四十七年迄今尚未通過」（人民日報，1971.3.9: 6）。而當「女性」被用於描述中國人時，則更多地用於描述不屬於無產階級、但又有新潮思想的「新女性」，例如，「秋瑾是為民主革命而第一個被殺頭的革命女性」（人民日報，1979.12.5: 6）；最典型的是對五四時期「新女性」的稱呼：「她們還存有剪刀痕跡的短髮，睜著稚氣的眼睛，帶著發自內心的熾熱的革命激情，散發著隨時準備為革命而犧牲的浪漫氣息。這正是五四運動狂飆時期培養出來的新女性的典型」（人民日報，1982.5.2: 5）。「婦女」和「女性」的用法差異最顯著地體現在 1964 年的評論〈怎樣看待婦女問題〉中：

在討論與婦女有關的問題時，必須具有明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處於不同時代、不同階級地位的婦女的思想觀點，作出清晰的階級分析，而不能把人生觀和戀愛觀點這樣帶有嚴格的階級性的問題，當成抽象的、一般的「女性」或「男性」的問題來提出（人民日報，1964.10.28: 5）。

這表明，「婦女」是一種帶有社會性、歷史性和階級性的指稱，而「女性」則是生物性的、抽象的和去階級的。改革開放以來，二者的用法差異正逐漸消失，「女性」越來越多地用來指稱從政治領導人到普通百姓、從工業界到學術界的所有女性，但在官方文件和領導講話稿中，「婦女」還是佔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

##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通過選擇特定的報導題材、核心人物和敘事框架，《人民日報》明確了「婦女解放」的鬥爭對象、領導主體和最終目標，將這一抽象概念轉化成公眾容易理解、接受和認同的共識：即「婦女解放」是由黨和政府及婦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將中國婦女從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中拯救出來，也是全球反帝鬥爭和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在「婦女解放」中，勞動不僅是獲得平等權利的條件，也是每個婦女的基本義務；此外，「婦女解放」也是國家建設議程的一部分且服務於後者，因而在包括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等在內的政治運動和政策中，婦女都應當積極參與且發揮重要作用。

歷時地看，「婦女解放」話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各有其側重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的十七年時期，「婦女解放」更強調兩性的權益和義務平等，「婦女翻身」、「當家做主人」等口號頻見報端，呼應著這一時期全新的性別秩序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確立；文革時期，在全社會重新「革命化」的背景下，「婦女解放」的階級鬥爭和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更為濃厚，更加激進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成為主流；1980 年代以後，「婦女解放」伴隨著改革開放出現了去革命化的趨勢，「四自」口號開始流行，精英化和個人主義的苗頭隱現；1995 年世婦會以來，更加多元而務實的議題——如家庭暴力、性騷擾、農村婦女小額信貸等——開始出現，女性的切身利益而非義務得到更多關注，「女權主義」也偶爾以非負面但仍然是舶來品的身份出現在報導中。

本研究終止於 2014 年，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以來《人民日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報》中的性別話語呈現出了某些與前一階段不同的特徵。「家風」一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報導和政治發言中，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各種場合強調「家庭建設」對於社會治理和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2.5: 1），而女性在家風和家庭建設中的角色和作用也被不斷強調，例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六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就提到，「要發揮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創建文明家庭，倡導科學家教，弘揚良好家風」（人民日報，2016.11.21: 4）。在2015年和2016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報導中，《人民日報》分別刊文〈珍視文明成長的「她力量」〉（2015.3.8: 4）和〈全面小康呼喚婦女智慧和力量〉（2016.3.8: 1），這裡的「她力量」或「婦女力量」就包括有著較強本質論色彩的女性家庭角色：「女性的細膩和感性，可以讓家庭更具溫馨氣氛；女性的平易親和，更易調和家庭關係、化解家庭矛盾；女性的勤儉操持，讓家庭免於雜亂無章，更讓孩子們在潛移默化中播撒下德行的種子」（人民日報，2015.3.8: 4）。相比於前一階段，《人民日報》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表述更加保守。

縱觀過去的近七十年，儘管《人民日報》在不同階段將「婦女解放」表述為具有不同的目標、任務和側重點，但其不變之處在於：「婦女解放」總是符合且服務於當前的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局，呈現出較強的工具性。追本溯源，這一特徵源自《人民日報》的機構屬性：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它擔負著「積極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職能；而其所屬的人民日報社則是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其社長及總編輯均屬正部級領導，故而其報導的題材、體裁及採納的框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央政策和政治話語整體風格的直接影響。因此，不難理解：十七年時期的「婦女解放」彰顯出一個新建立政權破舊立新的銳氣，文革

時期的「婦女解放」則提出了最激進的性別平等口號，改革開放以來「婦女解放」的目標和政策更加務實且關注個體，而 2014 年以來漸趨保守的性別倡導則呼應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的政策轉向。

此外，本文還試圖回應 1979 年以來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不愉快聯姻」（the unhappy marriage）的討論。Heidi Hartmann（1979）曾提出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結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中，階級分化使女權運動分裂和喪失殆盡；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權主義中，女權主義又是如此明顯地從屬於階級鬥爭。本研究表明，在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婦女被作為「強制性的勞動力蓄水池」（Zuo, 2013），其權益和主體性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服從於階級鬥爭和民族國家的發展目標；但在此過程中，婦女也獲得了衝破傳統性別桎梏的經濟解放和精神解放，特別是身處社會經濟中下層的勞動婦女的權益和發展被重視，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共同追求的社會公正得到保障；反而是 1980 年代以來，在中國進入全球市場體系後，資本邏輯對性別關係加以重塑，位於階層和性別交叉地帶的勞動婦女面臨著被重新邊緣化的危險。從這點來看，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的聯姻不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最後，由於篇幅有限，本研究尚未能對以下與本研究相關的問題作出探討，在這裡列出，願與感興趣的學者共同探討。首先，受制於研究時段，本文未及對 2015 年至今《人民日報》婦女解放議題的相關報導進行細緻爬梳，儘管上文已提到其日趨保守的趨勢，但其具體的報導樣態及其對近些年萌發的民間女權運動（如反對性騷擾、反對家庭暴力等）和思潮做出的反饋，還有待研究。其次，本研究僅分析了《人民日報》的文字報導，而未將相關報導的圖像資料納入分析，圖像在建構社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會議題、促進公共話語傳播以及確立文化領導權方面向來扮演著關鍵角色，故而未來的研究可對婦女解放議題的相關影像資料做視覺修辭方面的研究。再次，上世紀八十年來以來中國傳媒體制的改革給「婦女解放」的話語建構帶來了新的機遇，除了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一些市場導向的大眾媒體也在積極參與「婦女解放」的話語建構，兩類媒體在經營方式、報導範圍以及媒體文化等方面有較大差異，這也將導致二者在性別議題上呈現出不同的立場；以《南方都市報》為例，根據研究者的初步觀察，其對於「婦女解放」和「女權運動」的報導在數量、題材和價值判斷上都與《人民日報》有較大區別，這種差別一方面來自於新聞源的差異：《南都》坐落於廣州，這裡有著較為活躍的民間女權組織及女權活動；此外，《南都》的市場化導向及其對受眾閱讀興趣的關注也會對其報導方式產生著影響。因此，對《南都》等市場媒體的性別話語建構進行研究也有重要的意義。另外，中國女性運動的發聲主體和行動主體也正日益多元。長期以來，能夠在《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發聲的多為政治領袖、公務人員及其他的社會中上階層，草根女性及民間女權組織大多處於沉默的甚至被壓制的狀態；新興信息與傳播技術的普及為中低階層女性以及非官方女權組織提供了發聲平臺，她們建立了諸如「女權之聲」、「新媒體女性」、「女泉」以及立足女工的「尖椒部落」等微博帳號和微信公眾號，就主流媒體當前避而不談的流動女工權益、同性戀等議題發起討論。這些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如何重塑中國的性別話語？它們會對官方媒體和公眾產生怎樣的影響？都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 參考文獻

- 〈不堪婆婆丈夫虐待 王娥狄被逼自殺〉（1950 年 6 月 28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中央蘇區宣傳文化建設大事記：1931 年〉（無日期）。取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151935/227176/227180/15873635.html>
- 〈中國共產黨推進婦女解放的八十年〉（2001 年 6 月 23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5 版。
-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介〉（2008）。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 [http://www.gov.cn/test/2008-10/28/content\\_1133091.htm](http://www.gov.cn/test/2008-10/28/content_1133091.htm)。
- 〈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1956 年 5 月 27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世界婦女大會上兩條路線的鬥爭〉（1963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3 版。
- 〈全面小康呼喚婦女智慧和力量〉（2016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全國婦聯發出「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活動通知〉（1987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全國婦聯發出紀念「三八」節通知〉（1979 年 2 月 14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全國婦聯舉行七屆四次常委會〉（1995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2 版。
- 〈亞洲婦女為民族獨立人民民主與世界和平而鬥爭〉（1949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怎樣看待婦女問題〉（196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5 版。
- 〈迎接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1957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削去人間一不平——談北京市封閉妓院〉（1949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6 版。
- 〈美國人民加速覺醒的一個新標誌〉（1971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6 版。
-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到〉（1970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報》（中國），第 2 版。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 〈致讀者〉（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中國），第1版。
- 〈動員全國婦女勤儉建國，勤儉持家〉（1957年9月9日）。《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婦聯十一屆一次執委會議舉行〉（2013年11月2日）。《人民日報》（中國），第4版。
- 〈報社簡介〉（2016）。取自人民日報社網頁  
<http://www.people.com.cn/GB/50142/104580/index.html>
- 〈發揮婦女在崇尚科學反對迷信中的作用〉（1999年8月6日）。《人民日報》（中國），第3版。
- 〈徹底清算江青八次竄到天津的滔天罪行〉（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中國），第5版。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85）。《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書 Marx, C. [1959].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Russia: Progress Publishers.）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86）。〈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第三十七卷，頁1-26）。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99）。《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書 Engels, F. [1884].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Hottingen-Zürich, Schweizerland: Verlag der Schweizerischen Volksbuchhandlung.）
- 中國婦女「四大」籌備組理論組（1976年8月21日）。〈億萬婦女在鬥爭中高歌猛進〉，《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生產部（1952年6月15日）。〈大量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合作互助組織，繼續培養更多的婦女豐產模範〉，《人民日報》（中國），第2版。
- 文向東（1964年9月19日）。〈歌頌了什麼樣的「反抗」〉，《人民日報》（中國），第5版。
- 毛澤東（1960）。《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王政（2010）。〈創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文化陣地：《中國婦女》（1949-1966）〉，《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47(6): 58-75。
- 王蕾（2011）。〈從“女劳模”到“女明星”——從《中國婦女》60年封面人物看國家意識形態控制下媒體女性形象變遷及國家話語轉變〉，《新聞記者》，12: 87-92。
- 本報評論員（1989年3月8日）。〈面對時代的挑戰〉，《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任莉、張宿堂（1988 年 1 月 29 日）。〈女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全國婦聯呼籲立法保護〉，《人民日報》（中國），第 2 版。
- 全國婦聯無產階級革命派（1968 年 3 月 17 日）。〈勞動婦女堅決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江澤民（1995 年 9 月 5 日）。〈在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歡迎儀式上江澤民主席的講話〉，《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陳跡（1949 年 12 月 8 日）。〈我們的精神是相通的——記亞洲各國婦女代表聯歡會〉，《人民日報》（中國），第 1 版。
- 吳學華（1993 年 4 月 27 日）。〈分房不給女方對嗎？〉，《人民日報》（中國），第 5 版。
- 宋臻（2003 年 10 月 26 日）。〈拒絕性騷擾 維護人格尊嚴〉，《人民日報》（中國），第 8 版。
- 李克強（2016 年 11 月 21 日）。〈在第六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李淑錚（1995 年 6 月 21 日）。〈中國婦女闊步邁向世界〉，《人民日報》（中國），第 3 版。
- 李斌（2015 年 3 月 8 日）。〈珍視文明成長的「她力量」〉，《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李曉宏（2013 年 1 月 9 日）。〈春節回誰家折射老齡化煩惱〉，《人民日報》（中國），第 13 版。
- 周朗等（2004 年 2 月 27 日）。〈家庭暴力：女性之隱痛〉，《人民日報》（中國），第 6 版。
- 於梨華（1985 年 5 月 22 日）。〈美國來的信〉，《人民日報》（中國），第 8 版。
- 林韋（1951 年 9 月 17 日）。〈磚壁村的女青年團員和勞動婦女們〉，《人民日報》（中國），第 3 版。
- 金一虹（2006）。〈「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1: 169-193。
- 姜小燕（1997 年 12 月 3 日）。〈我改嫁能否帶走兒子？〉，《人民日報》（中國），第 9 版。
- 柏棣（2014）。〈「告別革命」和「去解放」：中國「婦女研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思潮〉，嶽素蘭、魏國英（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研究》，頁 157-16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胡鵬林（2006 年 5 月 25 日）。〈文藝批評的價值與社會主義榮譽觀〉，《人民日報》（中國），第 9 版。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 夏衍（1979年12月5日）。〈秋瑾不朽〉，《人民日報》（中國），第6版。
- 夏衍（1982年5月2日）。〈不能忘卻的紀念〉，《人民日報》（中國），第5版。
- 翁華（1959年3月8日）。〈各國婦女積極爭取和平和自身權利〉，《人民日報》（中國），第6版。
- 郝建秀（1985年3月8日）。〈郝建秀在全國婦聯紀念「三八」暨表彰大會上講話〉，《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區夢覺（1949年10月12日）。〈和全國姊妹們談談人民政協〉，《人民日報》（中國），第4版。
- 曹玲娟（2006年10月30日）。〈上海立法細化婦女權益保障 首次界定五種性騷擾形式〉，《人民日報》（中國），第10版。
- 許祖華（2007年12月23日）。〈中國婦女研究會年會暨兩性平等與和諧社會建構研討會召開〉，《人民日報》（中國），第4版。
- 陳陽（2006）。〈碎片化的女性新聞：對《中國婦女報》的內容分析（1990-2002）〉，《婦女研究論叢》，4: 57-62.
- 彭珮雲（2000年2月15日）。〈為推動婦女發展提供理論支援〉，《人民日報》（中國），第9版。
- 新華社（1950年3月8日）。〈檢閱力量加強團結姑姑和平民主陣線〉，《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楊凱（2016年2月5日）。〈家風——助推中國治理的「東風」〉，《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第1版。
- 董樂山譯（2017）。《1984》。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 Orwell, G. [1949]. 1984. London, UK: Secker & Warburg）
- 劉北成譯（2001）。《臨床醫學的誕生》。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Foucault, M. [1963].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edical*. Pari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蔡暢（1949年12月11日）。〈蔡暢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人民日報》（中國），第1版。
- 蔡暢（1955年4月15日）。〈列寧論社會主義建設和婦女解放〉，《人民日報》（中國），第3版。
- 蔡暢（1958年3月8日）。〈鼓足幹勁踏踏實實辦實事〉，《人民日報》（中國），第2版。
- 蔡暢（1958年12月14日）。〈提高覺悟，學好本領，為建設社會主義奮勇前進〉，《人民日報》（中國），第2版。
- 蔡暢（1978年3月10日）。〈緬懷向警予同志〉，《人民日報》（中國），第2版。

- 鄧穎超 (1957 年 9 月 21 日)。〈在全國婦女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鄧穎超致閉幕詞〉，《人民日報》(中國)，第 4 版。
- Barlow, T. (1994).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In A. Zito & T.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pp. 253-89).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rlow, T. (2004).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 Haan, F. (2012).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WIDF): History, main agenda, and contributions, 1945-1991. Retrieved May 4, 2015, from [http://wasi.alexanderstreet.com/help/view/the\\_womens\\_international\\_democratic\\_federation\\_widf\\_history\\_main\\_agenda\\_and\\_contributions\\_19451991](http://wasi.alexanderstreet.com/help/view/the_womens_international_democratic_federation_widf_history_main_agenda_and_contributions_19451991) (N/A)
- Dirlik, A. (1989). Revolutionary hegemony and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Chinese socialism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In A. Dirlik & M.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pp. 27-40). London, UK: M. E. Sharpe, Inc.
- Evans, H. (1998). 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 gender and 'jiefang'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ourse. *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Retrieved from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1/harriet.html>
- Hartmann, H. I. (197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 Class*, 3(2), 1-33.
- Lenin, V. (2011).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Co.
- Li, X. (1999). With what discourse do we reflect on Chinese women? Thoughts 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in China. In M. M.-H. Yang (Ed.),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pp. 261-277).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išková, K. (2016). Sex under socialism: From emancipation of women to normalized families in Czechoslovakia. *Sexualities*, 19(1/2), 211-235.
- Molyneux, M. (1981). Women's emancipation under socialism: A model for the Third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9(9), 1019-1037.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Tong, P. (2014). *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siang, P. (2001). The women's studies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G. Peterson, R. Hayhoe & Y. Lu (Eds.), *Edu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430-451).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urley, W. (1972). Women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Vietnam. *Asian Survey*, 12(1), 793-805.
- Wang, Z. (1999).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婦女解放」還是「女權主義」？以《人民日報》看中國國家敘事中性別話語的變遷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uo, J. (2013). Women's liberation and gender obligation equality in urban China: Work/family experiences of married individuals in the 1950s. *Science & Society*, 77(1), 98-125.

# ‘*Funvjiefang*’ (Women’s Liberation) or ‘*Nvquanzhuyi*’ (Feminism)?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ender Discourse in People’s Daily

Yalan Huang\*

## ABSTRACT

Differentiating ‘women’s liberation’ and ‘feminism’ provides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to constru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By employing discourse analysis of 1628 articles in People’s Daily from 1949 to 2014,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rough certain discursive strategies Socialist Feminism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women’s liberation’ is a socialist movement fighting against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in the movement, gender equality is constructed mainly as obligation equality, and women have to work in the public sphere to gain their equal rights. Furthermore, women’s liberation is not a stagnant discourse and has different focuses in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1980s, the reappearance of ‘feminism’ discourse in China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object to understand ‘women’s liberation’.

**Keywords:** Funv Jiefang (Women’s Liberation), Nvquan Zhuyi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People’s Daily, Discourse analysis

---

\* Yalan Huang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